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

安介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人口迁移法则(规律)的探讨与总结, 是人口地理学及移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历史悠久, 移民运动纷繁复杂, 为迁移规律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作为探索性的尝试, 作者借鉴西方学者在迁移理论研究的成功经验(例如“拉文斯坦法则”), 根据大量已有的移民实证研究成果, 提出了历史时期发生于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五个方面的规律(法则), 即政治主导法则、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灾荒与移民法则、民族迁移法则、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

关键词: 移民地理学; 拉文斯坦法则; 政治影响; 人口承载力; 文化区域特征

中图分类号: K901.9; C922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4)05-0667-10

人口迁移是引起人口数量空间分布变化的主导因素, 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 人口迁移研究又与出生率、死亡率的研究构成了人口学研究中的三大核心内容, 另外, 这项研究也可归入移民地理学(Geography of Immigration/Emigration)的研究范畴。近年来, 以六卷本《中国移民史》^[1]为代表的一批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 标志着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工作已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有关人口迁移规律(或“法则”)等理论性探讨却仍处于较朦胧、较模糊的起步阶段。实证研究是理论探讨的基础, 理论探讨是实证研究的升华与提炼。在大量实证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 是有力推进研究工作的必然需要。

人口迁徙规律是人口发展规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西方学术界很早便涉足于这一领域的探讨,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理论, 如“拉文斯坦法则”、“引力模型”、“推—拉理论”、成本—效益理论、流转理论等等,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2]。其实, 历史时期纷繁复杂的中国人口迁移运动, 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实例与可信的论证资料, 使我们更有条件将理论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故而笔者不揣浅陋, 提出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 抛砖引玉, 就正于方家及学界同仁。

1 “拉文斯坦法则”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西方学者对人口迁移规律的探讨开始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早成功地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学者 E·G·拉文斯坦(E·G·Ravenstein)。他于 1876 年《地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3], 以及在 1885 年^[4]与 1889 年^[5]两次提交英国皇家统计协会的发言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法则(the Laws of Migration)”,

收稿日期: 2003-12-15; 修订日期: 2004-04-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 中国历史地理学(01JAZD770007)

作者简介: 安介生(1966-), 男, 北京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 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

这些法则通常又被学术界称为“拉文斯坦法则”。根据拉文斯坦文章所归纳出来的迁移法则主要有：

(1) 移民主体距离法则 “通常移民们经过长途跋涉，力求迁往一个规模较大的商业与工业中心城市，而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主体只是移动了一个较短的距离。”(1885:198~199 页)从空间距离上看，人口迁移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移动。这条法则强调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产生的影响，即净迁移率与迁移的距离成反比，移民的总数随着迁移距离的延长而递减，真正最后进入迁入地定居下来的移民，通常只占起初全部迁出移民的少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移民回流的因素，也有迁入地对外来移民的抵触作用等。

(2) 阶梯式迁移法则 “当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发生时，通常会出现移民潮：人们总是涌向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商业与工业中心。……通常迁移又是呈阶梯式地发生：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这一城市周围的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抢先进入这个城市。……而这些移民外迁后留下的空隙区域就会由来自更远地区的人们所占据，就这样，迁移在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式地形成，直至日益增长的城市吸引力影响到王国最偏远的角落。”(1885:198~199 页)

(3) 移民潮与反向移民潮法则 对于某一特定区域而言，迁出与迁入总是相对进行的。大多数移民过程都是一种双向运动。“每一次移民潮发生之后，总会有一次反向的、补偿性质的移民潮的出现。”(1885:199 页)尽管两次移民运动在数量上不一定对等。

(4) 城乡移民差异法则 “与乡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更少移动性。”(1885:199 页)即乡村居民更富有移民的倾向。

(5) 性别选择法则 “妇女们似乎在较短距离的迁移中的数量更占优势。”(1889:288 页)即女性移民在短途迁移中数量更多，然而参与较长距离迁移的妇女数量则不及男子。

(6) 经济因素主导法则 即大多数移民的发生都出于经济方面的因素。“恶劣的、压制性的法律条文、沉重的税务负担、令人生厌的气候、无法适应的社会生活氛围甚至其它强制力……所有这一切已经导致或仍然在促使移民潮的产生，但所有这些因素，都无法与大多数人为改善他们物质生活的强烈欲望所激发出的动力相比拟。”(1889:286 页)

(7) 经济发展或技术进步促进法则 即经济与交通的发展都会刺激移民的增加。拉文斯坦在文中指出：“过去几乎在任何地方我都做过比较，我发现交通工具的增加、制造业与商业的发展都会引发移民的增加。”(1889:288 页)^[6]

(8) 迁入地选择法则 人口总是朝着大的商业与工业中心城市迁移，特别是那些跨越长距离的移民，这种目的特征更为明显。

(9) 年龄选择法则 大多数移民是年龄在 20 至 35 岁之间的成年人。

(10) 城市发展与移民法则 很多大型城镇的发展主要借助移民的推动，而不是依靠它们自身的增长^[7]。

拉文斯坦的探索性工作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引发了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对人口规律研究的热潮，迄今为止，仍是国际学术界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人口迁移理论之一。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拉文斯坦法则”进行了种种修正与补充，但这些法则在总体

拉文斯坦本人并没有逐条列举出所有的“移民法则”条目，以下各条法则都是学者们根据拉文斯坦的文章总结出来的。参见“Raventein's migration model,”选自“Basic Information on Migration from <http://www.geograpyjim.org/migration.htm>”。

上并没有被彻底地推翻。在拉文斯坦之后，研究者还提出了不少人口迁移理论，但就影响力而言，均很难超过拉文斯坦法则的地位与贡献^[8]。笔者认为：拉文斯坦的研究立足于大量人口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却没有简单地结果套用在某一种数理模式上，而是对移民运动进行宏观把握与抽象提炼，力求用简捷平实的语言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勾勒出移民运动的特征。这些“法则”及理论的提出，对于促进学术界对人口迁移问题的关注，以及推动移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有莫大的裨益。其贡献与作用并不会轻易被单一而抽象的数学模型或推导公式所覆盖或取代，对于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更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作用与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曾断言：“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9]人口迁移规律也应该如此。当然，决定人口规律的主客观因素绝不仅限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地理环境、大众心理、人口构成、人口密度等因素也都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不同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社会里，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人口迁移规律。拉文斯坦阐释的“人口迁移法则”，是根据 1871 年与 1881 年的英国人口统计资料，以及一些国家的相关资料提炼而成，因而带有十分突出的时代与区域特征。其所总结的法则，集中反映了工业革命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时期人口迁移运动的总体特征，特别强调了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化趋势对移民运动的重要影响。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套用“拉文斯坦法则”来讨论中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运动的努力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尽管人口规律与人口迁移规律随着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各国地理与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但作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群体运动形式，各国以及各地区的人口迁移活动之间毕竟还会有不少共通之处。深入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运动的规律与变化特征，对于推进对中国境内移民运动的研究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法则（规律）举要

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从上古夏、商、周三代直至清末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的人口迁移运动，都是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即移民史）研究的范畴。就人口构成而言，华夏汉族人口从秦汉时期开始占有了总人口的多数，因而也就成为大多数移民运动的主体；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可分为农耕与游牧两种类型。其中居住于长城以南地区的华夏（汉）族以农耕生产为主，而居住于长城以北与西北地区的非汉民族通常以游牧业为主。

限于客观的历史条件，中国历史人口研究主要建立在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证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单纯依据人口统计数据。笔者提出的人口迁徙“法则（规律）”，也主要依据学者们已有的较为成功的实证研究。这些法则（规律）初步归为以下几大类。

2.1 政治主导法则：中心凝聚律、动乱驱散律、强制反弹或强制抵消律等

正如拉文斯坦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因素是引发近代英国人口迁移运动的主导因素。拉文斯坦认为：人们渴望改变自己经济状况所产生的拉力，通常都远远超出恶劣气候、高额赋税等因素所造成的推力。因此，有些学者将拉文斯坦视为“推—拉迁移理论”的创始者之一^[10]。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历史时期中国移民运动最主要的动因却源自政治因素与影响，因而与政治相关的迁移规律也就更多、更复杂。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中国便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这种体制形成的权力控制网络的终端完全集中

于中央政权及皇帝本人手中。与之同时,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人口的政治作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政权建设与维持都无从谈起。为此,历代封建王朝都建立起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大大限制了普通百姓的自由迁移。政治主导法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首都是一个政权的最重要的据点与标志,历代王朝以及割据政权统治者们都特别重视首都的人口建设,同时,首都又是中央各级权力机关的所在地,也是皇族、官僚家族聚居之地,需要大批僚属及服务性人口,对外来人口的需要及拉力都较为强烈,因而首都或首府一般都会迅速发展成为其境内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也就是所谓“中心凝聚律”。在中国历史上著名大都城(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等)的建设发展史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大批移民的加入。通常,首都人口迁入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原来土著人口的自然增长。首都的人口迁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自愿迁入者,包括大批外省籍贯的贵族、官吏、儒士、奴仆、工商业者及其眷属等等;另一部分则为强制迁入者。前一种移民最为常见,其特点是迁入地分散,移民构成复杂,移民次数多而累积数量大。后一种移民则常常是官府有组织的移民运动,次数不多但是数量庞大,迁入首都后往往会形成有特色的移民群体。历史时期向首都地区的强制移民屡见不鲜,如秦朝的实关中移民、西汉陵县移民、北魏的代都移民等等。这些移民都会使首都地区在较短时间里人口骤增,甚至出现“人满为患”的过饱和状态。如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自高祖刘邦起,就开始实施陵县制度,即除了为皇帝建造巨大陵墓外,为避免皇帝死后寂寞,还迁来大量关东人口,安置于陵墓附近,并特设陵县加以管理。由此,“五陵”地区成为关中繁盛一时的移民聚居区^[11]。另如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不仅是北朝政治中心,还是当时东亚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及佛教中心。据文献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即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12]可见,当时洛阳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已远及西域各国,大批异域移民的到来,已将洛阳城构建为具有相当大规模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次,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建立,是以消灭地方割据及自治势力为前提的。而专制体制的维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权力核心——皇帝及最高决策者们权威性地位的稳固。一旦这种权力核心的权威性丧失,必然造成权力控制网络的全面崩溃。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致命的威胁,进而极大地冲击当地人口构成的稳定性,引发新的人口迁移运动。王朝变更、政治中心转移以及政治动乱爆发等等,都会造成相当长的时间里权力核心的缺失,从而成为激发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移民浪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历史时期发生的最著名的三次大规模移民运动(“永嘉南渡”、“安史之乱”之后的人口迁移以及“靖康南渡”)都是由政治动乱及首都迁移所引发的,是笔者所云“动乱驱散律”的典型体现。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事实上已拉开了“永嘉丧乱”的序幕。在中央权威丧失殆尽、行政权力控制网络陷于崩溃的状况下,蕴积已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全面爆发。南匈奴首领刘渊等率先起兵反晋,建立汉国。汉国军队先后攻占晋朝两都(洛阳与长安),俘获晋朝怀帝与愍帝,西晋政权垮台。于是,居住于首都洛阳一带及中原地区的官民四处奔逃,或西至河西,或东到辽东。因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即位,建立东晋,因此,其中南下者居多,“中州士女避乱江左(即江东,指今安徽芜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者十六七”,史称“永嘉南渡”。根据学者的研究,“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

约（一）百四十万（《晋书 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13]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句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描写的正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后爆发后人口南迁的情形。唐朝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掀起的狂飙自北向南，席卷华北，横扫两京（长安与洛阳）——当时人口最为繁庶的地区。聚留于两京及周围地区的士大夫与平民慌不择路，四处奔逃，其中还是以南走吴越（即今江苏省南部与浙江省北部）者居多：“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虽然还都于长安，先前发生的人口迁徙也有明显的回流迹象。但北部中国却从此无法恢复平静，人口流徙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14]。

靖康之乱，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剧变，由其引发的“靖康南渡”在中国移民史上影响极为巨大。靖康元年（1126年），金朝军队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俘获徽、钦二帝，北宋政权土崩瓦解，北部中国陷于动荡无序之中。在金朝军队的压迫下，中国北方各地的官绅、百姓大举南逃，其迁徙规模是空前的。据现代研究者估计，当时大约有500万人南迁。因继起的南宋政权以杭州为行在所（即临时首都），由此以杭州为核心的江浙地区便成为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区域^[15]。

再次，由政治强权直接操纵实施的强制性移民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成为中国移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终的移民效果却不尽相同，甚至相差悬殊，难以一概而论。笔者以为：强制移民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效地减轻迁出地的人口压力与人地矛盾，以及是否迁入地拥有充裕的、适宜移民定居的生存空间。如果根本不考虑移民的意愿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的实际人口与环境状况，单纯凭借武力与强制手段进行的移民，最终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强制抵消或反弹律。这也是拉文斯坦所云“移民潮与反移民潮法则”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体现形式。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强制性移民颇具有代表性，各个割据政权都将迁徙人口作为充实自己，削弱敌方（或征服地区）力量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故而强制性人口迁徙特别频繁，然而其迁徙结果往往为反方向的逃难所抵消。如后赵石氏政权在攻灭前赵刘氏政权后，将大批关中地区民众迁往河北地区。但在石虎死后，后赵国内爆发内讧，自相残杀，那些强迁而来的各族移民纷纷逃难，“青、雍、幽、荆州各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余万，各归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16]此前后赵政权向其首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及河北地区实施的多次强制性移民行动完全归于失败，这种强制性移民及其反向迁徙的结果是千百万移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极其恶劣。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迁入地属于地旷人稀，人口密度远低于迁出地，移民可以得到从事生产生活的土地，那么，即使迁移之时带有强制色彩，然而这种移民运动的稳定性仍会大大增强。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明朝初年山西“大槐树移民”。在元末农民战争以及明初“靖难之役”中，山西地区受到冲击较弱，人口数量及密度明显高于周边省份，因此，明朝官府多次组织实施大规模移民行动，将山西境内的百姓迁往河北、山东各地。后来，这些移民的后裔均称自己从洪洞大槐树（或云“老鹳窝”）迁来，故通常又称之为“大槐树移民”。虽然这场移民运动留给广大山西百姓的是相当痛苦的回忆，但总体而言，这场大移民还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缓解了山西地区的人口压力及人地矛盾，而且对河北、山东等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7]。

2.2 人口密度及人口承载力决定移民法则：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人口承载力决定律等

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各个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口密度也各不相同。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土地人口承载量也存在着巨大差异^[18]。“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与拉文斯坦所提出的“阶梯式迁移法则”颇有相通之处,即一次人口大迁移所造成的区域性人口空隙或所谓“真空”,会引发周边人口的迁徙,来弥补或填充空隙与“真空”,从而形成新的移民潮。当然,这种所谓“真空”只是相对于文献记载而言,既包括曾有人类居留记录的区域,也包括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地球上真正的“真空”或“空白”地带必然不能适应人类居住,但是,在一个面积可观、具备必要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区域内,要想维持长期无人或少人居留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或称“真空吸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在历史时期蒙古高原(汉文文献通常分称为“漠北”与“漠南”)的移民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秦汉以来,“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高原地区长期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匈奴人最早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组建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他们分布的地域东到大兴安岭南段、西辽河流域,西至阿尔泰山东侧及河西走廊,这一广袤地域便被称作“匈奴故地”。在南、北匈奴分裂以及北匈奴败亡之后,鲜卑人大规模西迁,全面占据了“匈奴故地”,形成了新的游牧部族大联盟,其中包括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及吐谷浑等重要分支。在鲜卑人南迁后,柔然、高车丁零又先后迁居蒙古高原。至隋唐时期,大漠南北又出现了以突厥、回纥、薛延陀为代表的铁勒部族大联盟。在一个部落联盟远徙或衰亡之后,很快便有另外的部族迁入,填补所留下的“真空”区域,这也就是笔者所称人口梯度决定律或“真空吸引律”的典型体现。

明末清初所谓“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也是“人口密度梯度决定律”的极好证明。经过明朝末年社会动乱与农民战争的严重冲击,至清朝初年,四川地区地旷人稀,十分荒凉。在清朝官府的鼓励与支持下,湖广地区(今湖南与湖北两省)的平民开始大量涌入四川。根据学者的研究,“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间,四川人口的数量从50万增加至232万,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8‰。”其中,“康熙二十年以后迁入的移民总数及其后裔约为98万。”^[19]

孤立而静止地谈论人口密度,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们对人口密度考察的真正目的,在于发现各个地区之间人口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的不同。人口密度的高低主要是由当地人口承载力所决定的。长期维持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其人口承载力也相对较高;反之,如果某一地区长期保持地旷人稀的局面,对外来人口缺乏吸引力,则可证明这一区域的人口承载力是相当低的。然而,一个特定区域对人口的承载量总是有限度的,因此,人口密度绝不是一个无限变量。与“真空吸引律”相反,当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接近与超过当地的人口承载力时,即达到“饱和”状态,由此激发的人地矛盾就会迫使当地人口的一部分向外迁移。这也就是所谓“人口承载力决定律”所起作用的具体表现。

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同一区域的人口承载力也会有很大变化。总体而言,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多数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人地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但是我们依然不难找到由于人口超载而引发的人口外迁的事例。如吐谷浑民族原本与慕容鲜卑属于同文同种的东部鲜卑集团,居住于辽东郡(今辽宁省辽阳市)一带。两者分离的起因就是两部为马群争夺牧地而引发的纠纷。争执的结果是较为弱小的吐谷浑一部脱离故地而西迁,最后进入青海湖地区^[20]。又如拓跋鲜卑创立的北魏王朝建都于句注塞以北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称为“代都”。为迅速扭转当地人口稀少的状况,拓跋鲜卑统治者在军事征服的同时,频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代都人口在较短时间里急剧增长^[21]。然而,雁北

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交通条件决定了当地有限的人口承载力水平。根据笔者的研究，随着移民的增多，代都地区不断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在严重自然灾害发生时，不得不外迁平城人口到各地“就食”。到太和初年，平城地区严重的饥荒状况又迫使大批平民外迁，因此，孝文帝最终迁都洛阳，与其说是仰慕汉化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更应说是出于代都地区有限的人口承载力的驱迫^[22]。

2.3 灾荒与移民法则：灾荒驱遣律或饥荒驱遣律等

制约人口承载力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制约人口承载力水平的主客观因素包括：可耕地面积、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包括降水、温度、无霜期等）之类，可归为自然因素；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社会分配制度、贫富差距、交通状况之类，可归为社会因素。应该说，上述多数制约因素与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难以改易的特性，惟有气候条件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及决定性影响。如果说传统的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那么这个“天”主要就是指气候条件。风调雨顺可使农民得到较好收成，甚至是“五谷丰登”；相反，严重的自然灾害却会直接破坏农业生产或粮食生产，造成食物的短缺，将区域性人口承载力的水平降至最低点。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灾害与饥荒程度便成为决定人口承载力水平的最关键因素。

在自然灾害肆虐及粮食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死”与“徙”，不愿等死的人们只有选择外出求食或“就食”。历史上通常将由灾荒引发的、缺乏稳定性的迁移人口称为“流民”。于是，每次严重自然灾害降临之时，也就是又一场流民运动爆发之日。自然灾害的肆虐程度以及饥荒程度，与流民运动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相对应，同时也与流民转化为长久性移民的比例成正比。因此，在政治因素之外，自然灾害成为引发移民浪潮的又一种重要诱因。这也就是笔者所谓“灾荒驱遣律”或“饥荒驱遣律”。例如明代是流民问题特别突出的朝代之一，大量流民的出现与明代北方地区自然灾害的肆虐有着直接的关联。以山西高原为例，根据笔者的研究，仅从永乐十年（1412年）到弘治十一年（1491年），山西境内人口的非正常损失就超过200万口，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与“徙”。大批山西流民永久地离开了山西，成为明代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的主力军^[23]。可以说，灾荒驱遣律是人口承载力决定律的又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2.4 民族迁移法则：周边民族向心律、汉民趋边律等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变，华夏汉族与非汉族在分布上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局，历史上称之为“华夷”五方格局，五方即为“中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在这种格局中，华夏汉族居于“中国（即以伊水、洛水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而非华夏族则居于较为偏远的“四裔”地区^[24]。然而，自秦汉以来，周边民族迁移的浪潮势不可挡，其迁徙的主要方向就是内迁，即向中原地区迁移。很多非华夏民族迁入长城以南后，逐渐与汉族融合起来，从而在历史上消失了。这也就是“周边民族向心律”的主要内容。历史时期内迁中原的重要民族有匈奴人、丁零人、乌桓人、鲜卑人、契丹人以及金朝女真人等等。如从东汉初年开始，匈奴分裂为北匈奴与南匈奴两部，南匈奴全面迁入汉朝边境一线。在南匈奴与东汉军队的联合攻击下，北匈奴日趋衰弱，直到最后全面崩溃。但是，南匈奴并没有因此重返塞北，到三国曹魏时期，并州地区（今山西省大部）成为南迁匈奴的最主要聚居区，当地匈奴人故而又被称为“并州之胡”。乌桓人与鲜卑人均发源于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其祖先被称为“东胡”，曾长期役属于匈奴人。分布位置偏南的乌桓人更是长期遭受匈奴人的欺压，因而他们更早地接受东汉官府的资助，协助东汉军队共同对抗匈

奴人的侵扰,这些都促使其聚居区逐渐向南迁移,进入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到三国曹魏时期,强悍的乌桓骑士已成为中原军队中的精锐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历史时期华夏汉族向蛮荒及边疆地区的迁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通常,汉民徙边的原因多为躲避赋役与灾祸。对农耕技术的熟悉,非常有利于汉族移民适应新的迁居地。汉族移民常常将农耕技术带入边远地区,从而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时至清朝,汉民徙边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实现全国政治疆域大一统的状况下,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内地汉民向边疆地区移民问题上的政治壁垒也大为削弱,出现了向边疆地区移民的高潮,其中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移民有“走西口”、“闯关东”等。这些汉族移民不仅有力促进了边远地区农业生产,而且对于维护与巩固边疆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5 移民与文化区特征法则:雅文化从优律、俗文化从众律等

人是文化最重要、最活跃的载体,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成为共识。广义而言,“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内容宏富的概念,涵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成果;狭义而言,文化可分为有成熟的物化成果的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与以大众生活风俗习惯为主的俗文化两个部分。雅文化体现在精神文化与物质生产技术方面取得的所有先进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制度建设、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在雅文化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从秦汉到明清,各个内迁的非汉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汉族雅文化的成就,因而“汉化”也就成为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民族内迁之路,往往就是“汉化之路”。北魏是最早由北方非汉民族建立的重要王朝,而孝文帝迁都改制又是全面“汉化”运动的一个典型例证。金朝建立后,先后迁都于燕京(今北京市)与汴梁(今河南开封市),这种迁都历程同样与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进程同步。这些“汉化”事实都是“雅文化从优律”的极好证明。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民间风俗的地域性差异。然而,人口迁移让不同习俗的人们走到了一起。那么重新组合起来的区域社会的风俗特征又会是怎样呢?笔者以为:移民区风俗特征往往取决于占当地人口多数的民族或移民群体的风俗特征。这也就是所谓“俗文化从众律”。以关中地区为例。秦、汉两朝相继定都于长安,并向这一地区大举迁徙关东人士,由此关中地区也一跃成为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地。其俗文化自然以汉族风俗为主要特色。然而,从东汉开始,氐、羌等西部民族开始向关中地区迁徙,到西晋初年,关中地区人口构成已出现“戎狄居半”的状况。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出现了前秦、后秦等氐、羌族首领建立的政权。至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依然还是非汉民族人口众多、风俗剽悍的所谓“险绝之土”^[25]。

如果说语言文字的研究、文学艺术品的创作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则方言应归属于俗文化的范畴。移民与方言地理之间的关系更充分反映出“俗文化从众律”的作用。人口的迁移可直接导致方言地理格局的变化,如同一方言的移民在某一地区迅速聚集,在数量上超过当地的土著人口,就可形成一种独特的“方言岛”现象。如南宋都城杭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大批北方移民(特别以来自汴梁一带的移民居多)的聚集,使杭州地区的方言及风俗特征与旧都汴梁有颇多相似之处^[26]。

3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现象异常复杂,涉及到政治变迁、人

口承载力、自然灾害、民族发展与文化传播等许多重要方面，从这些重要方面出发，考察与总结移民运动规律（法则），是笔者在本文中所着重强调的内容。必须指出，正如一场社会剧变通常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所引发一样，引发移民运动的因素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即使是在同一次移民运动中，往往也是多种诱发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所以，各种人口迁移规律（法则）发生作用之时，往往也不是孤立的、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有主、次之别而已。探讨其中的移民规律是一件非常艰苦而长期的工作。历史时期中国境内人口迁移规律的内容也远远不止于上述所列各条。归纳与验证对于理论研究是同等重要的，每一条规律或法则得以真正成立或被认可，都离不开大量实证研究的验证，也有必要借助于数理模式将迁移规律抽象而准确地表达出来^[27]。与此同时，将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与西方学者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移民历史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些都是今后研究工作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葛剑雄 主编. 葛剑雄, 吴松弟, 曹树基 合著. 中国移民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2] 张善余. 人口地理学概论.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79 ~ 387.
- [3] Ravenstein E G. Census of the British Isles, 1871; Birthplace and migration. Geographical Magazine, 1876. 3: 173 ~ 177, 201 ~ 206, 229 ~ 233.
- [4]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5, XLVIII, Part 2, 167 ~ 227.
- [5]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9. LII, 241 ~ 301.
- [6] Newman James L, Martzke Gordon E. Population: Patterns, Dynamics and Prospects. New Jersey. Englewood Cliffs. USA: Prentice-Hall Inc, 1984. 166 ~ 167.
- [7] Mayhew Susan. Oxford Dictionary of Geography (《牛津地理学词典》).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52.
- [8] Kammeyer, Kenneth C W / Ginn, Hellen.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6. 116 ~ 117.
- [9] (德)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92.
- [10] Weeks John R. Population.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238.
- [11] 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31 ~ 164.
- [12] (北魏) 杨衒之.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 卷 2.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161.
- [13] 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见: 长水集(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99 ~ 223.
- [14] 周振鹤. 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 中华文史论丛, 1987(第 2 辑与第 3 辑合刊): 115 ~ 137.
- [15] 吴松弟. 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 台北: 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3. 137.
- [16] (唐) 房玄龄, 等. 晋书. 卷 107: 石季龙载记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795.
- [17] 安介生, 葛剑雄. 洪洞大槐树. 寻根, 1997, (6): 13 ~ 15.
- [18] 刘立华. 关中地区土地生产潜力与土地人口承载量. 地理研究, 1989. 8(1): 16 ~ 27.
- [19]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95.
- [20] 周伟洲. 吐谷浑史.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1 ~ 4.
- [21] (日) 前田正名. 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59 ~ 94.
- [22] 安介生. 北魏代都人口迁出考. 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 西安: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6. 372 ~ 383.
- [23] 安介生. 山西高原人口承载量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增刊): 370 ~ 379.
- [24] 安介生. “华夷五方格局论”之历史渊源与蜕变. 历史教学问题, 2000, (4): 15 ~ 19.
- [25] 马长寿.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6 ~ 11.
- [26] (明) 郎瑛. 七修类稿. 卷 26: “杭音”.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94.
- [27] 王铮, 等. 人口扩散与空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地理研究, 1991. 10(1): 28 ~ 55.

Study on some laws of migr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 Jie-she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 Explora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laws of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historical migration study. Long history and complexity of migrating movements which happened in ancient China provides abundant sources for our research. Chinese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ase studies of migration and have published a lot of papers and works (e. g. Chinese History of Migration, 1997), but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presentation of migration theories. As an tentative work, using the foreign scholars' successful experience (e. g. 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 for reference, basing on many other Chinese scholars' achievement in this fiel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educes five categories of migration laws from Chinese history:

1. *Political dominance.* Political factors usually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many mass migrations. It is easily found that in many dynasties forced migration and free migration made the capital the most populous region. Chaos in transition of dynastie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s of refugees and forced them leave their homeland to find shelters. Forced current inevitably produced a compensating countercurrent.

2. *Density of popula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Carrying capacity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quantity of population who lived in a certain place. People tend to move to those regions of low population density. On the other hand, overcrowding would force some inhabitants to move to other places.

3. *Impelling of disaster and famine.* Chinese people were subject to repeated natural disasters in long history. Fierce disaster would damage agriculture badly and lack of food often threatened peoples' lives. Fleeing to other places to seek food gave people a way of saving their lives. The more fierce famine emerged, the more residents left their hometown.

4.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basic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was formed from pre-Qin period. The Han people gathered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scattered the frontiers and border regions. As a moving trend, people of other ethnic groups tried to move into the Central Plain, while the Han people escaped to border regions to avoid heavy taxation and corvee.

5. *Migrant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Migra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and custom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region were determined by the selection of migrants. Most migrants liked to accept the elegant culture achievement of the Han people while they kept their original customs and dialects.

Key words : geography of immigration/emigration; 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 political impact; carrying capacity for populati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